

南方的光與熱

——竹越與三郎《臺灣統治志》、《南國記》的台灣書寫與南進論述

邱雅芳

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摘要

《臺灣統治志》是日本史學評論家、政治家竹越與三郎（1865-1950）完成於1905年的作品，內容詳述了日本殖民台灣的發展。並且，書裡所引用的資料，全部來自當時台灣總督府的文書檔案，伴以大量的調查文獻與統計數字，強化了《臺灣統治志》的可信賴度。五年後的1910年，他又出版了《南國記》，論述的範疇則擴大到東南亞區域。這本書不僅對東南亞各殖民地政情有敏銳的觀察，也是一部帶有異國情調的遊記。《臺灣統治志》的文本性質顯然是為了宣傳殖民論述而寫，《南國記》在文學性之外則明示了作者的南進觀點。明治維新之後的日本，在其帝國主義的發展路線上，透過各種文本逐步建構出一套南進論述，進而形成一條政治無意識的南進系譜。竹越的作品可以說是這個論述的濫觴之一。台灣是日本南進政策上的起點，所謂的殖民地再現或南進思維以何種書寫策略出現在竹越的兩個文本裡，將是本論文所要詮釋的方向。

關鍵字：南方 南進論 南國記 臺灣統治志 竹越與三郎

南方的光與熱

——竹越與三郎《臺灣統治志》、《南國記》的台灣書寫與南進論述

一、引言

近代日本從明治中期以降，開始發展「南進論」，在代表的南進論者當中，竹越與三郎（1865-1950）是和台灣頗有淵源的一位。^[1]1905年（明治38）他出版一本宣揚殖民政績的《臺灣統治志》，^[2]內容詳述日本統治台灣初期十年的發展。作者在自序中提到了：「書中所引用的資料，主要是依據台灣總督府的贈與文書」，^[3]這些資料伴以大量的調查文獻與統計數據，增加了《臺灣統治志》的可信度。後藤新平（1857-1929）為該書所寫的序也讚揚這是一本考據精明、翔實描寫日本統治台灣實況的專書。^[4]兩年後，這本書還出版了英文譯本，向西方介紹日本的殖民統治。^[5]英文版本的出現，絕對不是偶然的，應該是日本殖民政府所主導的

[1] 竹越與三郎（1865-1950），日本明治到昭和期的史學評論家、政治家。埼玉縣本庄出身的竹越，是清野仙三郎的次子，1883年（明治16）成為竹越藤平的養子。慶應義塾大學中退後進入新聞界，先後在《大阪公論》、《時事新報》、《國民新聞》擔任政論記者，在這段期間也因為創作《新日本史》、《二千五百年史》而得到陸奧宗光、西園寺公望的知遇，成為雜誌《世界之日本》的主筆。竹越後來進入政壇，1898年（明治31）在伊藤內閣的西園寺文相之下擔任文部省勅任「事官」，翌年渡歐到各國視察。1902年（明治35）以來當選過五次的眾議院議員，隸屬於立憲政友黨，1940年（昭和15）被任命為樞密顧問官。竹越在1915年（大正4）和本野一郎、池田成彬等人發起「日本經濟史編纂會」，在1919年（大正8）刊行了《日本經濟史》8卷，成為確立日本經濟史學的礎石。此外，還有《臺灣統治志》、《陶庵公》、《南國記》等著書。

[2] 竹越與三郎，《臺灣統治志》（日本東京：博文館，1905）。本文參考之複刻本係由台北：南天書局發行，1997。

[3] 竹越與三郎，〈臺灣統治志を提す〉，《臺灣統治志》（南天複刻版），頁1。

[4] 後藤新平，〈序〉，《臺灣統治志》，頁2。後藤新平（1857-1929）是醫生、官僚、政治家。曾擔任台灣民政長官、滿鐵初任總裁、遞信大臣、內務大臣、外務大臣、東京市（現在的東京都）第七屆市長、東京放送局初任總裁、拓殖大學第三屆校長，也是日本發展帝國主義時期具有才能的殖民地經營者與都市計畫者。在台灣總督府民政長官（1898-1906）與滿鐵總裁（1906-1908）的任期中，支持日本的大陸進出政策，任鐵道院總裁時對於國內的鐵道整備具有貢獻。此外，關東大地震後，擔任內務大臣兼帝都復興院總裁，訂下了東京都市復興計畫。

[5] Yosaburo Takekoshi, *Japanese Rule in Formosa*, London: Longmans, Green and Co., 1907. 本文參考之版本係由台北：南天書局發行，1978。將日本版本和英文版本相互對照，可以發現英文版本並非逐章、逐字翻譯，而是有所刪減。

書寫計畫的一部份。

1910年（明治43），竹越又出版了《南國記》，論述的範疇則擴大到東南亞區域。這本書不僅對東南亞各殖民地政情有敏銳的觀察，也是一部帶有異國情調的遊記。日本學者矢野暢在其著作《「南進」的系譜》指出，明治時期的南進論者中，志賀重昂和竹越與三郎這兩位人物是最值得注目的，因為他們的見解有別人無法取代的特點。志賀重昂（1863-1927）在他的《南洋時事》中，重新賦予「南洋」以獨特的概念而有別於西洋與東洋。而竹越與三郎的《南國記》則是讓日本大眾階層對「南進論」普及認知的開山之作，原因除了作者的知名度之外，還包括竹越與三郎的文章與文體的魅力。^[6]

矢野暢對於志賀重昂、竹越與三郎的評價，自然無法脫離明治到昭和時期的歷史氛圍。明治維新之後的日本，在其帝國主義的發展路線上，透過各種文本逐步建構出一套南進論述，進而形成一條政治無意識的系譜。這條系譜不必然直接和政治性權力有關，而是分別存在於知識性、文化性、道德性的權力中。藉由殖民地官吏、人類學者、詩人、小說家的各種書寫記錄，建構出日本帝國的南方主義。南方主義是一個逐漸形成的論述，是一種描述南方、詮釋南方、支配南方的方式，也是文化霸權體系的無遠弗屆。志賀重昂和竹越與三郎可以說是這個論述的主要奠基者之一。本文選擇以竹越與三郎為主題，除了他的《南國記》在南進系譜上的重要性之外，也因為他的台灣相關作品《臺灣統治志》。

在《臺灣統治志》的書寫準備階段，竹越與三郎兩次來台蒐集資料，隨後他又以親身的台灣經驗，應用在對東南亞各殖民地文化、社會、政情的觀察上，而完成了《南國記》。誠然，竹越與三郎的台灣與東南亞之旅，為他帶來了豐富的殖民地想像，

[6] 關於矢野暢對於志賀重昂和竹越與三郎的討論，請參閱《「南進」の系譜》（日本東京都：中央公論社，1975），頁55-64；《日本の南洋史觀》（日本東京都：中央公論社，1979），頁16-49。志賀重昂（1863-1927）在日本岡崎市出生，1884年（明治17）札幌農學校畢業。1887年（明治20）《南洋時事》出版，1894年（明治27）《日本風景論》出版，1927年（昭和2）去世。志賀重昂是日本聞名的地理學者，也是活躍的政治家、政治評論家。他根據自然科學來解明日本山水風景的專書《日本風景論》，以嶄新的眼光重新發現日本之美，是他最著名的作品。

《臺灣統治志》與《南國記》其實也投射了帝國無限的欲望。《臺灣統治志》的文本性質顯然是為了宣傳殖民論述而寫，《南國記》在文學性之外也明示了作者的南方觀點。新聞記者出身的竹越與三郎，也是一位史學家、政治評論家、政治家。在帝國主義與知識運作的共同基礎上，竹越與三郎的政治地位與史學、文化專業，成為相輔相成的力量，而對明治以降的南進論述形成一定的影響。

近年來以竹越與三郎為主題的研究論述，據筆者所知，只有中研院台史所張隆志博士的論文〈知識建構、異己再現與統治宣傳：『台灣統治志』（1905）和日本殖民論述的濫觴〉，這篇論文主要側重於竹越《臺灣統治志》對後藤新平治台政策的肯定論。^[7]本文的考察重心，則置放在竹越的台灣書寫和南進論述之間的關係，並以薩依德「東方主義」（Orientalism）、文化與帝國主義的觀點來分析歷史文本《臺灣統治志》與《南國記》的殖民書寫。台灣是日本南進政策的起點，所謂的殖民地意象或南進思維，以何種書寫策略出現在竹越與三郎的兩個文本當中，將是本論文所要詮釋的方向。

二、《臺灣統治志》的殖民地論述

未開の國土を拓化して、文明の德澤を及ぼすは、白人が從來久しく其負擔なりと信じたる所なりき。今や日本國民は絶東の海表に起ちて、白人の大任を分たんと欲す。知らず我國民は果して黄人の負擔を遂ぐるの幹能ありや否や。臺灣統治の成敗は、此問題を解決するの試金石と云はざるべからず。^[8]

白種人很久以來就相信：拓殖尚未開化的疆土並為其帶來文明的德澤，是他們所要擔負的責任。現在日本國民正從極東的海洋崛起，希望分擔白種人的大任。不知我國民果

[7] 請參閱張隆志，〈知識建構、異己再現與統治宣傳：『台灣統治志』（1905）和日本殖民論述的濫觴〉，「文化啟蒙與知識生產（1895-1945）國際學術研討會」，台灣大學台文所、音樂所主辦，2005.11.26。這篇論文為張隆志博士在國科會「世變中的啟蒙：文化重建與教育轉型（1895-1949）」整合型研究計畫之部分成果，論文初稿僅供討論，不得引用。

[8] 竹越與三郎，〈臺灣統治志に題す〉，《臺灣統治志》序，頁1。

真是否具有完成黃種人的承擔的才幹？台灣統治的成敗，可說是解決這個問題的試金石。（題臺灣統治志）

這是竹越與三郎在《臺灣統治志》寫下的第一段話，是這本書的微言大義所在，也點出了日本模仿歐美帝國的企圖，亟欲成為東洋的新霸權。毫無疑問的，西方殖民者相信，如果佔領未開化的土地是他們的任務，則不管被殖民者是否感謝或者理解，一旦這是他們的責任，就有如上帝所賦予的天職，應該去救贖落後的人種。竹越巧妙地挪用了這個概念，而把台灣統治的問題，成為試煉日本帝國是否具備殖民才幹的試金石。作者以此提問作為本書的開端，其書寫策略除了要向世人證明台灣統治的成功之外，也在向西方宣示歷經明治維新的日本已具備發展帝國主義的條件。這是因為台灣是日本第一個獲得的殖民地，當時日本國內有出現許多反對接收的聲浪。另一方面，西方也在注意逐漸崛起的日本帝國。台灣統治的成敗與否，對內對外，日本政府都承受極大的輿論壓力。

《臺灣統治志》的問世，志在以官方說法達到消弭雜音的作用。尤其是1907年（明治40）所出版的外文譯本，直接以英文面貌向西方介紹日本的殖民統治，此書能在頗短的時間內就翻譯完成，極有可能是日本殖民政府所主導的書寫計畫的一部份。《台灣日日新報》在該年的8月，還轉載了國外方面各報章對於此書的評論〈臺灣統治批評〉，文章中除了簡介《臺灣統治志》的內容之外，發言也多站在肯定台灣統治的立場。^[9]可見這本書應該為台灣總督府帶來正面的聲譽，也讓世人清楚台灣在成為日本殖民地之後的近代化過程。後藤新平為該書所寫的序言中提到了，世上議論台灣統治得失的很多，但是能夠做到善視篤論的很少，多半只在皮相摸索、無法切中核心。^[10]對後藤新平而言，由竹越與三郎來執筆書寫此書，應該是最佳的選擇，以他的專業學養與知名

[9] 〈雜報／臺灣統治批評〉（一）、（三），《台灣日日新報》，1907（明治40）.08.14,16，此篇文章是轉載歐美各報對於《臺灣統治志》的介紹與評價。另外，9月份還有另一篇文章也是相同性質的報導，請參閱岳洋譯（香港デーリブレス所載），〈雜報／臺灣統治批評〉（上）、（下），《台灣日日新報》，1907（明治40）.09.05,06。不過此篇文章在肯定日本殖民政策之外，也注意到台灣人民納稅沉重的問題。

[10] 後藤新平，〈序〉，《臺灣統治志》，頁1。

度，是絕對可以勝任的。不過，對台灣不甚了解的竹越，能夠迅速蒐集到資料並且完成書寫工程，其中得力於後藤新平的協助是不言可喻的。

1898年（明治31）2月末，兒玉源太郎就任台灣第四任總督，他隨即在3月初任命後藤新平成為台灣的民政長官。兒玉是歷任總督中，唯一同時兼任日本國內軍事要職的官員。在他擔任台灣總督的時期（1898-1906，共8年），由於軍政事務相當繁忙，因此待在台灣的機會很少。當時台灣總督府的政策運行，實際上是由後藤新平負責。後藤新平是醫學背景出身的民政長官，也是台灣現代化的重要奠基者。透過《臺灣統治志》的各章節，不難發現竹越在這本書裡面研究了台灣過往的歷史、地勢、自然、人種，以及在接受日本殖民之後所進行的土地與人口調查、生番狀態，在經濟開發方面則談到了專賣制度、產業狀況、通商貿易，還有衛生、教育各個人民生活層面的改革，監控人民日常細節的警察機關與司法監獄等等。^[11]行文中所展現的思維理路，可以窺探出後藤新平的治台政策。

在第一章〈殖民及殖民國〉，作者即透過生物學的原理來談殖民主義：「生物學的原則到處支配著人類」，在世界的文明發展中，都常伴隨以海洋的力量，強調以「海」做為媒介的移民或殖民方式。所以殖民的歷史，是和海運的歷史相始終的。而在海外據有殖民地的國家，就好像擁有庭園的人家，可以把國民所剩餘的活力往殖民地排泄出去，殖民地如花草一般吸收了這些排泄物卻轉化成更清鮮的空氣回饋給殖民母國。^[12]從海洋向外擴張的概念，是竹越與三郎提出南進論的重點，有別於當時另一派人士強調北進論；所謂北進論，是指從大陸方向往露西亞、朝鮮半島、中國北部等前進。^[13]在這裡可以看出，竹越與三郎將自己的南進觀點與後藤新平的生物學概念結合，指出台灣統治的合理性與利益性。

在同化政策方面，竹越對於日本憲法是否適用於台灣的問

[11] 請參考附錄一：《臺灣統治志》章節目錄。

[12] 竹越與三郎，〈殖民および殖民國〉，《臺灣統治志》，頁1-2。

[13] 矢野暢，《日本の南洋史觀》（日本東京：中央公論社，1979），頁50-53。

題，抱持反對的態度，這也和後藤新平的理念是相符的。在第三章〈臺灣統治法制上之觀察〉，竹越與三郎以為台灣的人種、風俗、歷史、風土等都和日本本土有所差異，日本法律若是直接移植到台灣來施行，一定會因為民情不同而造成紛亂，所以並不適用於殖民地。因此，在總督府提出因應台灣統治的獨立法制之前，還是繼續延用六三法為宜。在1905年（明治38）第21屆帝國議會中，竹越極力支持延續六三法。^[14]第三章所提到的政治理念，無論是對同化政策的排斥，或是尊重舊慣調查，不僅是後藤新平治台的特色，亦在強調台灣人和日本人的種差異。然而看似體貼殖民地人民的作法，其實也存在著日本人的優越主義。站在生物學的立場，台灣人的種是比日本人落後的，所以施行同化政策是不合宜的。至於舊慣調查，則是要鉅細靡遺地瞭解台灣人的生活習慣與風土民情，這和人口調查是相輔相成的殖民手段。

後藤新平認為掌握土地和人口是施政的根本，因此在擔任民政長官時期，推動地籍和戶籍調查不遺餘力。《臺灣統治志》第五章所談到的〈臺灣的地勢自然、人種〉、第六章的〈土地調查及大租權整理〉、第十四章的〈人口問題及國家營業主義〉都出現了精密的調查數據，另外在談論台灣經濟產業的各章也附加大量的統計資料，充分顯示了後藤新平對於調查與統計的偏好。在他擔任民政長官時期，以總督府技術官僚身份前往台灣各廳、視察國勢調查和統計相關業務，並且負責人口調查工作的水科七三郎（1863-1940），^[15]曾經在紀念性文字〈後藤伯與統計〉中提到後藤新平在統計上的才能：「人們所周知的後藤伯，是醫者、政治家，而且個性豪放、磊落。但是，一方面他極盡緻密、周到，特別是在統計上精通之事，則似乎不太為人所知。」水科七三郎在文章中還舉了二、三件事來說明後藤新平在台灣施行統計事業

[14] 竹越與三郎，〈臺灣統治の法制上の觀察〉，《臺灣統治志》，頁68-85。所謂「六三法」是1896年6月3日日本在台灣施行的特別法律，將台灣殖民地之立法權委交台灣總督，原本施行期間已3年為限，但是後來又被一再延長，並於1906年改為有效期限五年「三一法」，但是「六三法」與「三一法」在本質並無差異。

[15] 水科七三郎（1863-1940）生平不詳，1903年12月，以總督府技術官僚身份前往台灣各廳，視察國勢調查和統計相關業務。

的政績，其中談到他受命委託編纂《台灣十年間之進步》，^[16]以統計表來呈現台灣統治的發展：

後藤伯在民政長官任內，有一天我向他提議將領台以來十年間的進步用統計的方式呈現並公開刊行於世如何呢？長官理解我的想法之後，立刻引領我到樓上的書房，並且指示了書架上分類的各種統計，他說：「我曾經考慮過這件事，也一直在蒐集這方面的資料，但是尚未達到完成的階段，所以趕快著手進行吧。而在台灣財政獨立的計畫書方面因為有許多重要的統計，到峽事務官那裡去閱覽吧。」我接受了這個提示。自此數月之後，我編纂了和英對譯的《台灣十年間之進步》（The Progress of Taiwan (Formosa) for Ten Years 1895-1904），在明治39年2月出版並廣泛分發中外各地。雖然當時在內地好像沒有很大迴響，可是在歐美的新聞雜誌當中，也有將之摘錄或評論讚嘆台灣之進步的文章。而外國人對於統計的一目瞭然，亦表敬佩。^[17]

這一段憶往，不僅生動地描繪出後藤新平對於統計事業的熱衷，也可看出他在台灣統治的用心。而這些努力調查的過程，最後透過數據的方式呈現在世人面前，對不熟悉台灣的西方人來說，經濟的成長、產業的提升、教育人口的增加，都可以透過數字來描繪一個島嶼。數字的變化是一目瞭然的，也是最不需要思考的。而數字所代表的理性，也轉化成台灣統治的近代性。然而對居住在台灣的人而言，隱藏在數字背後的真相，可能是各項專賣制對台灣人民的剝削、日方資本家與勞農之間的薪資糾紛，或是選擇性的教育政策，這都被統計數字與圖表排列掩蓋了。這是一項高明的宣傳策略，《臺灣統治志》和《台灣十年間之進步》的出版，挾帶著強勢的理性思維，以大量數據向西方展現亮麗成績，學醫出身卻深諳統計技術的後藤新平，顯然也頗知如何向西方人

[16] 台灣總督府官房文書課編，《台灣十年間之進步》（台北：台灣總督府官方文書課，1906）。

[17] 水科七三郎，〈後藤伯と統計〉，《吾等の知る後藤新平伯》（日本東京：東洋協會，1929.07），頁314-318。本書為後藤新平逝世後的紀念文集。另外，文中所提到的「峽事務官」，應該是指當時任職總督府主計課的事務官峽謙齊，請參閱《台灣總督府職員錄》。

宣傳台灣統治。

後藤新平的專業是醫學，就促成殖民醫學的發展而言，後藤新平可說是台灣衛生與醫療政策的推手。除了推行各項經濟改革和建設工作之外，後藤對台灣衛生醫療制度的重大影響，則是鴉片漸禁政策與公醫設置制度。公醫制度是後藤在推行鴉片政策時所提出的，日治時期台灣的衛生與醫療行政都是屬於警務系統所監管，這也點出了醫學和殖民主義結合的特質。此外，在《臺灣統治志》的第八章〈警察機關〉與第十三章〈司法監獄〉可以看出，日據時期的警察，職權掌管範圍之大，幾乎包含了人民生活的全部。不僅是治安刑事上的維持，包括戶口調查、理蕃政策、保甲制度、衛生行政，甚至教育事業都受到警察的監控。在現代性／殖民性的一體兩面之下，台灣人只要不遵守法律或是不符合衛生習慣，都會被警察當作罪犯或病患而遭到隔離。竹越在書中也提到，以進步社會的標準來看，吏務和警務是必須分開的。但是因為台灣的社會狀態還是幼稚的，所以採取嚴厲的法治才能得到效果。因此要以家長式的、恩威並施的政治，隨時讓人民感受到警察的勢力。^[18]日治時期的統治策略，即是運用嚴密的警察體系來監控島民的生活與思想。因此警察是最基礎也是最嚴密的監控機制，他們的威權亦被無限膨脹。這種監控方式，使人民在日常生活中無法遁形。縱使人民表現出對警察的服從，其實是恐懼心態多於守法觀念。當時為了有效管理殖民地的人民，並且協助警察權威的行使，司法監獄、保甲制度等更多嚴厲的法律與規範也應運而生。

如果警察機關是對人民外在行為的管理，學校教育則是培養近代國民的地方。在第二十章〈教育、宗教、慈善〉，作者在開頭即直言：「開導台灣最必要、也是前途最遙遠的，則是教育吧」。台灣人必須透過教育做到移風易俗、改變心性，否則將和「支那人」一樣，追求生活享受與縱情慾望。^[19]竹越顯然對中國人懷有極大的偏見，而且將某些人的負面性格擴大成他對全中國人的刻板印象。在他的腦海中，落後中國的破敗身影，除了政

[18] 竹越與三郎，〈警察機關〉，《臺灣統治志》，頁245-246。

[19] 竹越與三郎，〈教育、宗教、慈善〉，《臺灣統治志》，頁478-479。

治上的腐敗，還包含了人性的墮落。他提到了中國舊社會的拜金主義，而和中國有血緣關係的台灣人，自然也是具有這種劣根性的。此外，對於中國父權家庭的批判，在最後一章〈臺灣歷遊雜錄〉，則成為他的焦點話題。

作為日本殖民政府治台政績的宣傳文本，《臺灣統治志》可以說是一部完全官方觀點的政治文本，只有在此書的末章〈臺灣歷遊雜錄〉，才能稍稍窺探作者竹越與三郎對於台灣的旅遊觀感。當他從基隆搭車進入台北城後，歷目所見的是清潔寬大的馬路、規模井然的市區，儼然出現新台灣的氣象。竹越指出，當時的爪哇被稱為世界的公園，但是他認為台灣繼續經營的話，數年之後，台灣不僅是日本的、也是世界的遊園地。^[20]不過，他也特別提到台灣的旅館風格，是殖民地旅行中令他感到不愉快之處。台灣當時的日式旅館不少，但是竹越認為在熱帶地方，西洋式的旅館才是最恰當的建築，然而台灣卻連一間歐洲風旅館都沒發現，這是相當遺憾的。依照竹越的想法，所謂的殖民地，是人們行樂的聚集地，所以應該注重娛樂設施，以達到安慰遊子的功能。因此殖民地經營者首先要規劃的，應該是公園、音樂館等建設。^[21]

在近代性的觀察之外，作者對殖民地的異國情調也有生動的描寫，例如渡河搭乘竹筏、坐轎旅行的滋味，還有台灣農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水牛、家鴨、豬群等景象。在本書所附錄的38張寫真，有交通、產業、教育、人種、建築、市鎮等各方面的台灣縮影，這些寫真也有如選擇性的觀景窗，當可看出作者對台灣的整體印象。^[22]毫無疑問的，台灣的氣候、風土、物產，都有別於日本本土，這也符合竹越對於殖民地的期望，做為國人吸收新鮮養分的地方。這些能夠滋養本國的養分，除了台灣豐富的山林資源、各項專賣之外，也包含了殖民地本身的娛樂功能。在殖民地經營者的持續開發之下，台灣將會成為其他殖民地的典範。然而，這些美好的願景，都只涉及到台灣的自然資源，另一方面，台灣人的文明性卻是竹越批判的對象。

[20] 竹越與三郎，〈臺灣歷遊雜錄〉，《臺灣統治志》，頁503。

[21] 同上註，頁514-515。

[22] 請參考附錄二：《臺灣統治志》寫真目錄。

竹越與三郎在旅台期間，非常留意台灣的婚姻制度，這也和他對中國家長制的批判有關。竹越會對這一議題表達高度關切，應該受他的妻子竹越竹代（1870-1944）的影響至深。竹越竹代是活躍在明治時期的婦女運動家，也是日本新聞史上第一位女性記者。^[23]竹越竹代所從事的文筆與婦女運動，是她在婚後隨丈夫赴東京生活後的活動。原本在大阪公論社執筆政論的竹越與三郎，1890年（明治23）年接受德富蘇峰的邀請，參與民友社的《國民新聞》創刊而回到東京。^[24]隨後來到東京的竹越竹代，由此展開她的文筆活動，除了用「竹村女史」的筆名為《國民新聞》撰稿，還以該報記者身份擔任採訪工作，這在當時的社會而言，都是史無前例的。德富蘇峰甚至邀請她為民友社的婦女雜誌擔任撰稿編輯工作，也在此時竹越竹代開始她的婦女運動。1891年（明治24）成為東京婦人矯風會委員，為「一夫一婦的建言書」而盡力奔走。1893（明治26）年加入日本基督教婦人矯風會設立委員會，和許多婦女運動者一起展開廢妾運動、禁酒禁煙運動等等。竹越竹代也擔任了東京婦人矯風會機關誌《婦人矯風雜誌》編輯，因此竹越與三郎在這段時期常向該雜誌投稿，以側面聲援

[23] 竹越竹代（1870-1944）出生於1870年（明治3），父親是岡山藩士族中村秀人，母親中村靜子則是岡山藩的儒學者石坂堅壯的次女。中村秀人在1880年（明治13）病歿之後，靜子獨力把竹代撫養長大。靜子受其家學影響，不僅資質聰穎而且是一位進步女性，後來皈依為基督教徒後更熱心於禁酒、廢娼等運動。竹代後來也和母親靜子一樣，在1883年（明治16）接受岡山基督教會的創立者金森通倫的受洗而成為基督教徒，先後就讀基督教派所住持的山陽女學校、大阪梅花女學校。她在高等女學校即將畢業之際，透過教友的居中介紹，認識了當時正在擔任新聞記者的竹越與三郎（三叉），在獲得母親的認同之下於畢業後即和竹越與三郎結婚。翌年1890年（明治23）竹越與三郎接受德富蘇峰的邀請，參與民友社的《國民新聞》創刊而回到東京。後來竹代也向《國民新聞》投稿，成為日本第一位的女性新聞記者。1891年（明治24）成為東京婦人矯風會委員，集中精力在「一夫一妻的建言書」，1893年參加日本基督教婦人矯風會，展開廢妾運動、禁酒禁煙運動，這個時期也刊行了《婦人立志篇》、《ウェスト女史遺訓》（維斯特女史遺訓）等作品。1909年（明治42）左右開始傾倒於佛教禪宗，從此展開刻苦修行，後來得到淺草寺的大僧正救護榮海授予「大阿闍梨」高僧資格。享年75歲。

[24] 德富蘇峰（1863-1957）是日本熊本縣水俣鄉士德富一敬的長子，小說家德富蘆花的兄長，本名猪一郎。青少年時期在各地求學的德富，1881年（明治14）回到故鄉創設大江義塾，也在地方新聞等執筆。1887年（明治20）上京組成民友社，創刊雜誌《國民之友》，1890年（明治23）創刊《國民新聞》。德富素以進步平民主義立場從事執筆活動，但是在日清戰爭後成為松方內閣的內務參事官因而遭到非難。1911年（明治44）成為貴院議員，1913年（大正2）離開政界轉向評論家活動。1937年（昭和12）因為《近世日本國民史》一書得到學士院恩賜賞。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德富的言論思想以皇室的國家主義為中心，1942年（昭和17）當上大日本言論報國會會長，1943年（昭和18）獲得文化勳章。德富在敗戰後被開除公職，晚年在熱海的晚晴草堂直到過世，享年94歲。

自己的妻子，這些作品多以探討女性地位為主，例如〈如何提高婦人的地位？〉、〈矯風事業首要之急務〉、〈日本婦人的三世相〉等文章。^[25]

從他們夫妻的文筆活動來看，就不難理解竹越與三郎對於中國買賣式婚姻的批判。其時台灣的漢人社會，自然還沿襲著中國傳統家庭制度，女性在家庭或社會上的地位是低微的。就竹越的觀察，他認為台灣女性是稍稍比中國女性享有自由的，但是在婚姻體制上還是不脫影響。最後一章，竹越侃侃而談自己對殖民地的觀察，輔以「舊慣調查會報告」來說明台灣家族中的夫妻關係，娶妻又納妾的實際狀況，也是造成家庭紛亂的根源。誠然，台灣婦女解放運動的起步比日本遲晚，竹越的進步思維也凸顯了台灣人的落後。在文化位階上，相當鮮明地呈現出日本人，臺灣人，中國人的高低排序。接受日本殖民的台灣人，顯然還有進步的空間。但是中國人的血緣、家庭、社會制度等等根深蒂固的文化背景，和重利的猶太人擁有很多相似點，是民族上的問題。^[26]而台灣人和中國人的血緣與文化關係，也相當程度地左右了竹越對台灣人的觀感。

但是有一些內地人，把台灣當作淘金的新天地，懷抱多少荒唐的夢想而來，最終卻敗興而歸。作者在書末提起這件事，無非是忠告他們要認清台灣的現狀。為了撰寫《臺灣統治志》，竹越與三郎遂有了他首次的殖民地之旅。竹越所認識的台灣，還是殖民地經營的草創階段。台灣的各種資源，也才正在開發途中。以他對古老中國的偏見，牽動了他對台灣的認識。在他的眼中，台灣不是一座金山，而是一塊尚待啟蒙的蠻荒地。當時的台灣社會，文明程度只能以「幼稚」而論，民智仍需開化。然而他也說，開導台灣最必要、也是前途最遙遠的，就是教育吧。竹越並不是要否認殖民者到目前為止的努力，而是認為台灣距離文明太遙遠了，「教育」肯定是一件艱辛的工程。不過，他在五年後所出版的《南國記》，台灣的蠻荒意象已經被別的殖民地所取代，這個南方之島也出現了轉變。

[25] 竹越熊三郎編／下山京子著，《竹越竹代の生涯／一葉草紙（伝記・下山京子）》（日本東京：大空社，1995），頁13-22。

[26] 竹越與三郎，〈臺灣歷遊雜錄〉，《臺灣統治志》，頁517。

三、《南國記》與南進論

明治中期以降，日本開始發展「南進論」，「南方」的地理方位，是以日本為中心座標，主張藉助「海洋」的力量往南方前進，鼓吹南洋是日本人海外進出最合適的地域。一方面，南進論述也強調，日本前進南方是具有使命性的，目的就是要改造南洋的未開發性、政治的落後性，也在於向歐美帝國宣示，開發海外殖民地不再是西方的特權。「南進論」的主張，最初雖然是日本帝國發展海外拓殖為目的，到了太平洋戰爭期間卻演變為基本國策，透過國家的直接介入，「前往南方」逐漸成為日本人的集體無意識。然而它的傳播系譜，絕對不只侷限在國家的政治宣傳之上，而牽涉到龐大知識體系的運作；在各種專業領域上，諸如科學家、人類學家、歷史學家、地理家、醫學家、作家、畫家、探險家等人物所生產的「南方」文本，逐步建構日本帝國的南進論述。本節的重心，就是要探討這條南進系譜的濫觴作品之一《南國記》。

1909年的夏天，竹越與三郎到南洋旅行，翌年出版了《南國記》。這本書在當時引起廣大的迴響，也召喚了許多日本人的南方想像。竹越在序文〈題南國記〉中，描繪了這趟旅程的始末：

去年，我立下志向，從荷領東印度諸島開始，巡遊了法領印度支那，進一步踏入中國雲南省，看了南方的一部分。這趟水陸的路程有一萬餘里，更換了十三次的船，嚐受著艷陽的痛苦、和巨濤奮戰，去程時穿著夏衣，歸程時已著冬衣。此行和歐美旅行相比之下，雖然生活上的愉快較少，但是觸目之風光、歷遊之山川、男女之人情、政治之組織，皆詭異怪奇至極，是我前後的旅行當中最具興味的。^[27]

透過這段序言，我們大致可以勾勒出作者航行的地圖。在長達半年的旅程，竹越強烈感受到南方的光與熱，獵奇的異國情趣。值得注意的是，此書並非單純的紀行作品，它深刻地傳達出作者的南進思維。在竹越筆下的「南國」，是南方之國的泛稱，也指喻

[27] 竹越與三郎，〈南國記に提す〉，《南國記》（日本東京：二酉社，1910），頁1-2。

南方的土地。作者對於南方的追求，在《南國記》第一章的標題「往南！往南！」即表露無遺。翻開第一章，竹越展現了獨特的文筆功力，他以一則寓言起頭，描寫有個獵人總是忙於觀察遠處樹上的鷹鳩，卻不知道眼前草叢中就有巨雉的存在，等到被人提示而往腳下查看時，大鳥早已展翼飛走了。這則故事在影射當時的日本人已然遺忘美好的「南方」，而苦苦追求遙不可企的空想。接下來，他還引了一首詩加以論證：

盡日尋春不見春，芒鞋踏遍嶺頭雲。歸來笑撚梅花嗅，春在枝頭已十分。

不難發現，寓言和詩的涵義都是相似的，^[28]竹越的用意在於點醒國人：我等的將來就在眼前的南方，只要能掌控熱帶殖民地就可以制服全世界，根本不需要辛苦北進大陸。《南國記》被評價為是讓日本的大眾階層對「南進論」普及認知的最初作品，原因除了竹越的知名度之外，也和他的文學技巧有關。少年時期就進入漢學塾的竹越，藉由閱讀中國史籍《史記》、《漢書》、《春秋左傳》等經典，奠定了深厚的漢學基礎。17歲時，他上京學習英文，一年之後入學慶應義塾，在福澤諭吉的門下開始大量接觸西方知識。^[29]在《國民新聞》的工作期間，他則對世界歷史產生濃厚興趣。^[30]竹越個人的知識體系，結合了漢學和西學素養，這種特質也反映在他的作品當中。

1890年到東京《國民新聞》擔任政論記者的竹越與三郎，在這段期間因為創作《新日本史》、《二千五百年史》而得到西園寺公望的知遇，^[31]1898年(明治31)進入政壇，在伊藤內閣的西

[28] 此詩出自宋代羅大經之《鶴林玉露》，作者為一佚名之女尼，題為〈某尼悟道〉。全詩以「尋春」比喻訪道，起初，不得入道之法，向東向西，四處尋找佛法真諦。結果「芒《「南進」の系譜》鞋踏破嶺頭雲」。實際上，佛行就在自心，不用向外去求。一旦領會，就覺悟到「春在枝頭已十分」。

[29] 福澤諭吉（1835-1901）是日本明治時期的著名思想家，福澤諭吉終其一生都致力於在日本弘揚西方文明，介紹西方政治制度以及相應的價值觀。他積極提倡當時正值經歷明治維新的日本應該放棄中國思想和儒教精神，「脫亞論」是福澤諭吉於1885（明治18）年3月16日在日本《時事新報》發表的著名短文。

[30] 矢野暢，《「南進」の系譜》（日本東京：中央公論社，1997），頁59-60。

[31] 西園寺公望（1849-1940），號陶庵，宮廷貴族清華家出身，德大寺公純次子，過繼西園寺師季。1871年（明治4）留學法國，1880年（明治13）回國後開辦明治法律學校（明治大學前身）。20世紀初期與桂太郎交替出任首相，1912年（明治45）任最後一任元老。逝世後舉行了國葬。

園寺文相之下擔任文部省勅任參事官兼秘書官，翌年渡歐到各國視察，另外他也以「竹越三叉」的筆名從事政治評論活動。透過這些履歷，不難推測出他受邀執筆《臺灣統治志》的契機。竹越1910年所出版的《南國記》，紀錄了南洋旅行的見聞所感，論述範疇包括了上海、廣東、香港、新加坡、爪哇及荷屬諸島（今印尼一帶）、法屬印度支那、台灣等地。^[32]這本書不僅對東南亞各殖民地政情有敏銳的觀察，也是一部帶有異國情調的遊記。此書出版後相當暢銷，一年多的時間就再版十次，如此迴響是異常程度之大的。這本書在當時也引起了大眾媒體的注目，主要的報章雜誌登出不少書評，而且對於竹越的主張大多給予積極的評價，可見這本書帶給社會極大的衝擊。^[33]

以海洋作為移民或殖民的途徑，竹越在《臺灣統治志》已經展現這種思維，《南國記》則將海洋連結南方作為概念，說明日本前進南洋的必然性。經由第一章〈往南！往南！〉的幾個小標題「國人忘卻南方」、「控制熱帶就是制服世界」、「島國在大陸上用力之不利」、「吾等之將來在南方」等等，可以看出他極力主張日本南進。他以世界史的興衰來說明「南方」的優勢性，更以日本民族的血統中混合了馬來人種的血液來聯繫日本和南洋的關係：

我們曾經在小學時被教導：「凡此地球上之人種可分為五，曰歐羅巴人種、蒙古人種、阿非利加人種、馬黎人種、亞米利加人種是也」。而此馬來人種居住於與大日本帝國南端相望之地，儘管他們血液的一部份混入我南方臣民的脈管之中，我國人卻把這擱置一旁，對他們馬來人的理解相當少，卻徒然談論歐美、中國為多，這豈不是求之高遠而失之卑近嗎。^[34]

當時日本關於民族起源之議，眾說紛紜，但是許多論調都和日本

[32] 請參閱附錄三：《南國記》章節目錄。所謂的「印度支那」是指中南半島（含馬來半島），也特指曾經是法國殖民地的「法屬印度支那」，包括今天的越南、柬埔寨、寮國。「印度支那」一詞是音譯自法文「Indochine」，表示位於印度與中國之間並受兩國文化影響的區域。

[33] 矢野暢，《「南進」の系譜》，頁61。

[34] 竹越與三郎，《南國記》，頁2-3。

帝國發展有密切關聯。人類學並非竹越與三郎的專業領域，不過他在其著作《二千五百年史》就主張「日鮮同祖論」、人類學的「混合民族論」，《南國記》則以日本天孫民族從南方而來，且舉日本和南洋在某些風俗的類似為例，指出日本人的血統當中也混合了南方的馬來人種。這也是為了和北進論（大陸進出）對抗，所以提倡日本應該往民族的故鄉「南方」前進。^[35]馬來人位居「南方」的座標位置，是對應日本本土的地理而來。馬來人所處的山洋群島不僅僅和日本比鄰，它也是作者眼中大且富足的殖民地。竹越提出日本民族和馬來人之間的血緣關係，是要強調往南洋發展的合理性。相較於日本人普遍對歐美、中國等國的文化、國情有相當認識，但是對於和日本民族有血緣關係、在日本南端遙遙相望的山洋島人卻一無所知，這不是捨近求遠嗎？竹越運用了他的世界歷史知識，建構出日本民族起源與南方的關係，無非是要以此支持他的南進論。但是就人類學的觀點來看，竹越的人種知識充滿了謬誤。

《南國記》引起爭議之處，倒不在於竹越所提出的混合種族論，而是他對馬來人的誤解；竹越關於馬來人種的定義，遭到人類學者鳥居龍藏的駁斥：「曰馬來者何。最後應注意者。係曰馬來者果何歟。生番之謂為馬來者。係西洋學者。自言語而研究之者。又據竹越與三郎氏所著南國記。則明謂安南東堡塞邊之民族為馬來。山路愛山氏之日本人種論。亦謂支那安南之人為馬來。是則以印度支那派之民族與馬來種族。混同而譯之者。其謬可知。」^[36]其實，不只是竹越與三郎，當時詮釋馬來人種的歷史學者也另有其人，山路愛山就是其中一位。^[37]竹越可說是南進論的混合民族論者，山路則是北進論的混合民族論者，彼此的立場雖然是對立的，卻不約而同地利用馬來人成為他們知識操作下的犧牲者。相當明顯的，兩人踰越自身的歷史專業領域而涉入了民族人類學的非專業範疇，他們發展出來的南進／北進論述，其實都

[35] 小熊英二，《單一民族の起源》（日本東京：新曜社，1995），頁98-99。

[36] 鳥居龍藏氏講演，〈生蕃人種之調查法〉，《台灣日日新報》漢文版，1911（明治44）.02.10。

[37] 山路愛山（1865-1917）本名彌吉，號愛山，是活躍於明治到大正初期的評論家、民間史家，和竹越與三郎是民友社時代的同事。當時山路愛山主張北進論的混合民族論，竹越與三郎則是南進論的混合民族論。

是日本人企圖統治未開的土地與民族之事業的一部分，文化與帝國主義之間的權力運作也在於此。

《南國記》的暢銷程度，顯示出日本人對於南方的好奇與窺伺，也可大略了解它在南進論的影響力。《台灣日日新報》在1911年12月16日的〈東京消息〉提到：「竹越氏的『南國記』多少有談到台灣，此書尚且受到許多讀書人的歡迎，這是可賀之事。但是其他關於台灣的有益著書，如當初的台灣史料、南疆釋史、台灣鄭氏記事、行在陽秋、淡水廳誌、台灣府志、台灣蕃政志、台灣教育志稿等書，現在的則像台灣總督府所編纂的台灣統治綜覽，都依然束之高閣，對殖民地台灣來說是遺憾的。」^[38]由於《南國記》其中有一個章節是討論台灣殖民現狀，這則消息認為《南國記》的眾多讀者也會看到台灣書寫的部分，肯定對宣傳台灣是有幫助的，但是其他和台灣相關、甚至是由台灣總督府所負責編纂的書籍卻乏人問津，對於編纂者的用心來說是相當可惜的。這個報導雖然是以台灣為出發點而寫的，但是《南國記》並不是因為書寫台灣主題而受到注目，它論及的內容涵蓋了整個東南亞區域。透過這則新聞，一方面凸顯《南國記》被日本人廣泛喜愛閱讀，一方面也可側面了解竹越的文字魅力。

在《南國記》的描寫下，未開化的南洋諸島，是人類歷史上嶄新的一頁。不難想像在日本人眼中，竹越所提到的極樂鳥、龍涎香、麒麟血、山竹果、荔枝，這些前所未見的名詞，不但帶來獵奇的趣味，也引起他們的南方想像。《南國記》是一本深具異國情調的遊記，紀錄了作者在東南亞各殖民地的所見所聞，而且他的書寫風格相當明快生動，從南方各地的歷史文化談起，到風土、物產、民情，再搭配上各地的人物寫真圖片，使讀者在閱讀文字之餘，隨即能透過視覺的接收進入情境。相較於《臺灣統治志》大量的統計數字與圖表排列，《南國記》則放重在南方的文化風情，從第二章到第七章，竹越介紹了上海居留地、香港、廣東，以及東南亞各殖民地，綜論南洋各地的歷史與地理知識，盡情發揮了作者的文史專長特色。另一方面，本書的書寫策略也是相當鮮明的，它的目的在宣揚作者的南進論觀點，所以在每一章

[38] 社外記者，〈東京便り〉，《台灣日日新報》，1911（明治44）.12.16。

的後半，作者都會探討當地的政治狀況，並且分析各殖民母國的殖民政策之優劣。作者的用心，除了參考歐美各國的統治手段，還有和他們一較長短的企圖。南洋的豐富資源，自然不能坐視讓西方帝國獨占，這也是竹越積極主張南進論的原因。

對於竹越的南進論調，大多數的輿論是持肯定立場的，這也多少可以看出日本的政治意向，但是其中也有極少數的負面評價。在一篇名為〈輕率的日本人〉的政論，作者田原生批評了竹越的《南國記》與贊同南進論的日本人：「竹越代議士之所論，是自我欺騙、自家擅著，有識者是讀後一笑置之的。但是這本書卻被多數浮躁虛華的日本人所歡迎，陷入聘馳於樂觀空想者多矣，令人不得不感嘆。」^[39]作者指出，南進論是太過輕率的主張，當前應該做的，是引導國民走向自知之道，並且藉由認真勞動以循序漸進，但是如此急進的南進論調，卻被多數浮躁虛華的日本人所歡迎，真是令人感嘆的事。《台灣日日新報》所發表的這篇文章，足以說明1911年（明治44）左右，南進論尚在萌芽的階段。日後它以勢如破竹的氣勢壓倒各種言論時，官方主導的報章雜誌上也難得會出現這種反對南進論的文章了。

1914年（大正3）第一次世界大戰勃發之際，日本加入了戰局並且向德國宣戰，旋即佔領了德屬南洋群島。自此以降，日本的南進經營論不再是紙上談兵，而是真正據有了的土地。在第一次的佔領後，日本迅速拓展在南洋的勢力範圍。透過竹越在1916年（大正5）所發表的一篇〈南洋進展策 支那人歸化案〉，當可看出日本發展南進政策的進程：「予遊南洋。因唱南進政策。前後不過七年。而我國人在南洋地方之企業。經已非常勢力前進。當初僅在馬來半島。今已擴張到蘭領『浩屢黎壩、斯馬特拉』殊可忭喜。」大正時期日本推動南進政策的重心，主要是在南洋進行拓殖經濟。南洋的重要物產橡膠，也就是塑膠的原料，成為日本發展南洋實業的重心，但是當時卻有勞力人口不足的問題。這篇文章的主旨，就是要解決這個問題，竹越與三郎建議招攬中國人到南洋工作，並讓他們歸化成日本人作為利誘：

現我日本人在蘭領地方。與歐洲人種。同受優等國之待

[39] 田原生，〈輕卒なる日本人〉（下），《台灣日日新報》，1911（明治44）。01.15。

遇。支那人則與印度人種。共蒙劣等國之藐貌。其中不耳。實為匪少。間有兄為支那籍民。弟為台灣籍民。兄弟之中。其待遇即不同。以台灣人亦日本民也。故其權利利益。隨之而異。現在南洋僑居支那籍民。相率欲為日本人者。已非一日。若令雇用于日本人事業或受其資助者。便可坐得日本籍。則勞働者無不靡然羣集於我事業。蓋此法嘗于暹羅實行之。予惟欲令我政府。一為倣效之耳。又此項章程。總要規定為經過僱用年限若干。始能取得國籍。而其國籍又要限在蘭領之內。去此則失。我國自有植民地以來。國籍之中。全不分載為登錄國民。抑植民地國民。與帝國臣民。頗為疎漏之點。此後宜設此制度。並以助長我南進實業策也。^[40]

為了獲取勞力資源，竹越建議招徠中國人來南洋，並以入日本籍為獎勵。但是，顯然這種入籍方式是差別性與利益性的考量。竹越提出的方式，必須要有一定僱用年限始能取得國籍，而其國籍又要限在荷屬領地之內，這無異是以日本的利益為主的條款。其次，所謂的「帝國臣民」、「植民地國民」、「登錄國民」，如名稱所示，就存在著身分差別，也象徵了位階高低以及國民權利的多寡。當時是否真如竹越所說：「現在南洋僑居支那籍民。相率欲為日本人者」頗令人存疑，不過這篇文章也點出了另一個議題，那就是中國人和台灣人的身分位置。在日本統治下的台灣人，雖然是被殖民者的身分，竹越認為其地位是比中國人高一等的。這種匪夷所思的現象，也說明了台灣人和中國人的政治處境。

竹越與三郎在1909年所展開的東南亞之旅，以台灣作為終點站，畫下圓滿的句點。曾經於1904年為了寫作《臺灣統治志》而來到台灣，五年後再度重遊殖民地，竹越驚奇地發現台灣有了神速的進步。《南國記》的第八章〈從印度支那到台灣〉以台灣發展為主題，在作者的觀察下，無論是和五年前的台灣相較，或是和東南亞各方的殖民地對比，現在的台灣都展現了近代化的優勢。從基隆港的規模到台北街道的革新，都市下水道、電力設備

[40] 竹越與三郎氏述，〈南洋進展策 支那人歸化案〉，《台灣日日新報》漢文版，1916（大正5）.02.04。

的整頓，甚至是台北官設旅館的美觀舒適，都讓竹越讚嘆不已。並且，在愉快的鐵道旅行中，他沿途參觀台灣西部的製糖會社、甘蔗園，感受到伴隨工業而來農業的進步，而番地開拓也擁有相當成績，這一切都歸功於日本殖民政策的各項創見。在竹越的描寫之下，台灣儼然是一個充滿和平歡樂的殖民地。其中，他最謳歌的製糖會社，被形容成兼顧蔗農權益與經濟收益的良心事業，這無疑問和台灣人的理解有極大落差。竹越的論調，極其美化台灣統治之能事，他是為了和歐美各國的殖民政策一較長短，企圖形塑超越西方統治的殖民地。

因此，在旅行過東南亞各國後，竹越確信台灣無論談社會安定、經濟發展或人民生活水準各方面，都比其他各殖民地還要傑出，這主要是因為日本在殖民政策上的耕耘。《南國記》把台灣部分放到第八章來談，其用意就是要比較出各殖民政策的優劣、殖民地人民的差別待遇，從而肯定日本在台灣統治的政績：

看到荷蘭、法蘭西等國家如何在他們的殖民地壓榨土人、虐待中國人，這和台灣土人境遇相較的話幾乎是天壤之別。在台灣不論是本國人或土人，在政治上都一視同仁、沒有區別。^[41]

對台灣人來說，這段話的可信度頗低。只要稍微理解殖民史的人都知道，日本統治台灣的50年，台灣人的生活境遇乃至於基本權利，從來就不可能做到和日本人一視同仁。在同化政策上抱持反對立場的竹越會說出：「在政治上都一視同仁、沒有區別」，乃是希望藉此凸顯日本殖民政策的人道主義。不過，無論竹越是故意掩飾真相，或者他真心認為台灣人被一視同仁的對待，他所說的話是有可能被廣大讀者相信的，尤其是不熟悉台灣狀況的內地日本人。這些宣揚台灣統治的帝國文本，更能透過翻譯的形式傳播到海外，而成為再現殖民地的樣本，也滿足了一般人所懵懂認知的南洋。竹越的《南國記》提到，他搭乘地洋丸在前往台灣的途中，船上英美旅客三十多人當中，就有兩人看過《臺灣統治志》的翻譯本。^[42]另外，據說《南國記》後來也被翻譯成法文，

[41] 竹越與三郎，《南國記》，頁320。

[42] 同上註，頁285。

連荷印總督都看過此書。^[43]可見文化與帝國主義的力量是無法輕忽的，竹越雖然沒有豐富的南方生活經驗，但是憑藉個人的史學知識與文字專長，企圖透過書寫再現殖民地的全景。竹越佔據了發言位置，也就擁有詮釋權。利用文字，他也掌控了更多的殖民地知識。

誠然，台灣是南進政策的起點，《南國記》的主題還是以「馬來人」為主。占領台灣讓日本開始學習如何經營殖民地，進而將台灣經驗挪用在其他殖民地的治理之上。《臺灣統治志》的書寫工程，讓竹越掌握了殖民地政策的運作方式，在《南國記》的書寫策略上，竹越則將帝國的目光投向南洋群島。為了使南進論更具有合理性，竹越在書末再次提起日本人和馬來人的血緣關係，並以此設問：如果日本人和馬來人親密到有共同的祖先，為何今天日本已位居世界大國之列，而和日本人同胞同系的馬來人卻在南洋地方過著奴隸狀態的生活：

說明這個問題嘛，馬來人是純粹的馬來人種再多少混入了劣等的黑色人種而已。可是日本人為了和中國大陸、朝鮮半島而來的稍高等人種相接合，所以興起血統混合，結果成為如今日般的大國民。^[44]

竹越顯然對「黑人」懷有極大的偏見，這應該和他接受西方歷史訓練有關。馬來人因為混合了黑色人種的血統，所以才會變成更加劣等的人種。而日本人則選擇性地混合了多種族的血液，最後成為現在這般優等的國民。緊接著他提到了馬來人居住的熱帶地區有取之不盡的天然資源，加上四季都是暑熱的氣候，所以人們不用辛苦勞動、終日懶惰過活，大腦無需思考、只要依照「飲食男女」的動物本能即可生存下去。這也是南洋地方人文不發達、無法產生文學的原因。竹越在最後所提出的文學觀：文章乃「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45]就是期許自己能夠以文學的力量，引導國人未來的方向。

日本帝國的未來將往何方？日本國民的明日將在何方？這兩

[43] 矢野暢，《「南進」の系譜》，頁63。

[44] 同註40，頁358-359。

[45] 同註40，頁366-369。

個議題恐怕是明治時期以降的知識分子亟欲找尋的答案，我們也可以從《南國記》的書寫脈絡中感受到這種迫切的心情。日本在明治維新之後，積極朝向文明開化、富國強兵的近代國家樣式，一方面也開始模仿西方帝國主義的發展路線。竹越與三郎遊歷東南亞之後，以《南國記》向國人宣告：日本的未來在南方，憑藉日本人和馬來人的血緣關係，日本到南洋發展的條件絕對比西方帝國更有優勢。而且，日本在台灣統治的成績，無論是人民的生活水準或是文明的改造程度，都比東南亞各個殖民地還要成功，這足以印證日本有能力成為明日帝國之星。為了凸顯和各殖民地的差異，《南國記》的台灣再現，顯然比《臺灣統治志》更趨向正面的展示，這是作者的書寫策略，也透露了強悍的帝國慾望。

四、前進南方：一種政治無意識

竹越與三郎的台灣與東南亞之旅，為他激盪出繁複的南方想像，也豐富了他的南方知識。在旅行的過程當中，他絕非一位單純的旅者；「觀光」不是他的目的，「觀察」才是他的重點。或者說他是以一個近代旅者的姿態，帶著文明性與殖民性的雙重目光，來凝視台灣與東南亞各殖民地的風景。他能夠周遊南洋，和他在政界的權力有關。有了權力便有能力到達這些殖民地，再藉由竹越本身的史學專業，以此考察東南亞各殖民地的狀況，然後透過文字再現殖民地的風貌。《臺灣統治志》的書寫目的相當明確，是為了宣傳日本殖民政策而寫。《南國記》則不僅是極具異國情調的遊記，在文學性之外也明示了作者的南進觀點。這兩個文本是竹越編纂與傳播的南方知識，是帝國書寫的一部分，也讓他掌握了殖民地的詮釋權。對於南方的一切，竹越顯然懷有強烈的憧憬。但是他所憧憬的，不是南方的光與熱，而是征服與支配。

對正在發展帝國主義的日本而言，台灣統治是一個試金石，以此檢驗日本是否具備開化蠻荒的能力。無可否認的，《臺灣統治志》縱使對台灣的未開程度有所擔心，但是作者毫不遲疑地正面肯定日本。台灣統治的成功，也激發了無限的帝國欲望。竹越在《南國記》的書寫策略上，以台灣經驗為墊腳石，主張藉由海

洋的力量往「南進」，才是當今日本人的使命。相當鮮明的，《臺灣統治志》的台灣意象是從蠻荒未開到半開。《南國記》的台灣再現，已從半開躍進到開化的近代社會，較諸東南亞各殖民地更具文明進步，其書寫企圖是不言可喻的。台灣作為日本南進政策的起點，它的指標性意義在於提供一個殖民地典範，甚至超越西方帝國在南洋的各殖民地。和歐美帝國發展史相較之下，雖然日本起步甚晚，但是日本以台灣統治為開端，展現了向西方模仿到競爭的企圖。

分析《南國記》的書寫脈絡，作者顯然已有遲到的焦慮。當時日本是帝國主義剛要起步的階段，日本列島的地理環境則四面環海又南北狹長、高山縱橫，因此竹越也在思索：日本帝國的未來將往何方？日本國民的明日將在何方？我們不禁可以從《南國記》中感受到這種迫切向前的心情。和西方相比的話，日本的近代性是遲到的。明治維新之後的日本，以「脫亞入歐」的決心積極向西方學習，希望能脫離漢文化圈的萎頓狀態。竹越與三郎在慶應義塾時期，成為福澤諭吉的門下。當時積極鼓吹學習西方文明觀的福澤諭吉於1885年（明治18）3月16日在日本《時事新報》發表著名的短文〈脫亞論〉，強烈建議經歷明治維新的日本應該擺脫中國和朝鮮這兩個鄰國：

為今之計，不能猶豫於等待鄰國開明之日再共興亞細亞，不如脫離他們的隊伍而和西洋文明國家共進退。對待中國、朝鮮方面也不必因為是鄰國的緣故就特別理會，只要按照西洋人應對他們的態度就可以了。與惡友親近的話則難免也會有惡名，我們要在心裡謝絕這種東亞的惡友。

這一段話是〈脫亞論〉的結論，也是福澤諭吉以文明性來檢驗中國和朝鮮的定見。他主張應在亞洲的東邊，創立一新西洋國日本，成為亞洲的新領導者。而對於像中國、朝鮮這些鄰國，既然它們還停留在半開化階段，日本自然不能與之為伍，而應脫離它們停滯、落後、愚昧的行列，加入進步、文明的西方陣營。對於文明論、人種優劣的概念，福澤諭吉完全是西方思維的，而他的「脫亞入歐」也成為日本在明治時期拓展政治外交的意識形態。有關竹越與三郎在文明開化的思維模式，或是對黑色人種、中國

人種的歧視，明顯受福澤諭吉影響甚大。竹越在他的著作中曾露骨地表達在文化上及種族上對中國的歧視，這也是對漢文化圈與儒家傳統的否定。^[46]因此，明治中期以降的南進論述，可為日本實踐脫亞入歐提供一個前進的方向。

明治時期的南進論，強調南洋的未開化性，主張日本有開發南洋的使命。大正時期的南進論，則利用實利主義的利潤與持續獲利的希望向廣大日本人號召，藉投資、開發南洋以增進日本經濟發展。到了昭和時期，「南進」逐漸演變成為基本國策，和大東亞戰爭共進退。不難發現，從明治到昭和時期的南進論述，隨著時局的變遷而有所變化。然而，在南進論述的建構工程中，製造「南方憧憬」是始終必要的條件。竹越在《南國記》裡，質疑歐美先進諸國的李洋開發能力，指出日本開發南洋的妥當性。他是透過南洋的未開性，以及日本人和馬來人的淵源，來加強自己的論調。這本書的問世，也為日本人提供一個想像南方的方式。但是換個角度來說，對中國人始終不抱好感的竹越，在大正初期的那篇文章〈南洋進展策 支那人歸化案〉中，會提出以入日本籍吸引中國勞動人口來南洋工作的方法，^[47]這也側面顯示了日本進出海外拓殖的一個困境；如何讓更多的日本人（包括殖民地的人民）志願前進南方？這也是南進政策當中，一個最根本的核心問題。《南國記》所建構的南方憧憬，應該有達到一定的效果，但是這個論述必須延續下去，讓它漸漸轉化成為日本人的集體無意識。

就像薩依德在《東方主義》描述下的西方人發現東方一樣，^[48]日本也積極地去發現「南方」。明治中期的南進論者當中，竹越與三郎只是其中的一位。最初，這套論述顯然是由一些經濟史、歷史學家所發起，可以說是關於南方／殖民地的風土民情、歷史想像的總起點，像是竹越與三郎的《南國記》、志賀重昂的《南洋時事》。後來慢慢加入了詩人、小說家、探險家、人

[46] 本文前述針對此點已有著墨，例如竹越與三郎在《臺灣統治志》中反覆批判中國人愛錢的本性，並與猶太人相提並論。

[47] 竹越與三郎氏述，〈南洋進展策 支那人歸化案〉，《台灣日日新報》漢文版，1916（大正5）.02.04。

[48] 愛德華·薩依德著，王淑燕等譯，《東方主義》（台北，立緒文化出版社，1999），頁69-102。

類學者以及殖民地的行政官員等不同領域的專家，他們建構出詩、小說、航海日記、人種調查、數據統計、殖民政策各種描述殖民地的文本。從而，在文化與帝國主義的相互運作之下，南方概念的挪用，不需要親自前往，也能透過南方論述的文字力量，而達到神往的境界。但是這種南方想像，也極有可能轉化為日本人再現南方的刻板印象，諸如南洋的蠻荒未開性、馬來人的怠惰性格、台灣原住民的兇暴本質，都可以成為一再被展現的南方樣式。

如同我們可以輕易在日籍作家的台灣書寫當中，發現南方／殖民地概念的挪用，以及他們對台灣原住民展現的高度興趣。例如，竹越在《臺灣統治志》裡曾經談過殖民地的「慰安」功用，後來作家中村地平在他的散文〈旅人之眼〉中，也提出要把台灣全島國家公園化，以成為撫慰南進者的休憩之地：「既然台灣是軍事、經濟的南進基地，那麼同時更必然是南進之人的慰安之地」。^[49]不論中村地平有沒有親自閱讀過竹越的著作，殖民地的慰安／遊樂園功能，顯然已經成為日本人思考殖民地的方式之一。此外，《臺灣統治志》所附錄的人物寫真，網羅了台灣原住民各族男女，可見作者把原住民展示當作重點介紹的意圖相當明顯。蠻荒的未開意象和台灣原住民的原始野性，對日本人來說是深具獵奇的異國情趣的。^[50]也難怪作家佐藤春夫曾經說過：當時大部分的日本人，都以為在台灣居住的全是「番人」，因此要在文章中特別說明台灣籍民是「支那人」。^[51]這些例子足以說明，台灣／南方概念可能被簡約化，並與「蠻荒」、「熱帶」、「番人」、「野性」等劃上等號。而作為亞洲唯一新興的近代國家日本，它的使命就在於「啟蒙」或「開化」這些亞洲的落後地區。

日本帝國主義的擴張過程中，絕非僅限於國家機器的運作，也得力於各種不同形式的協力。在摸索的階段中，竹越與三郎的

[49] 中村地平，〈旅びとの眼——作家の見た台灣〉，《台灣時報》，1939（昭和14）5月號。

[50] 請參考拙作，〈南方與蠻荒：以中村地平的《台灣小說集》為中心〉，《台灣文學學報》8期，2006.06，頁147-176。這篇論文有探討日籍作家對於台灣原住民題材的偏愛。

[51] 佐藤春夫，〈南方記行〉，《定本佐藤春夫全集》27卷（日本京都：臨川書店，1999-2000），頁14。

南方書寫，無異是日本嘗試建構南方主義的肇始之一。如同矢野暢所說的，日本的南方經略或南進論述，在江戶時代就有相關的思想言論，但是具有近代性意義的南進論，要到明治中期以降才真正誕生。^[52]南進論或者南方主義，是一種逐漸形成的論述，絕非一蹴可成的工程。明治中期開始，藉由殖民地官吏、人類學者、詩人、畫家、小說家的手，留下了描述南方、詮釋南方、支配南方的各種文本紀錄；從懵懂未明到清晰可見的「南方」，再現了一個非常龐大的南方實體，讓日本人可以輕易看見、掌握，進而形成一條政治無意識的南進系譜。帝國的政治與文化之間的聯繫是極其密切的，所以這條系譜不必然是直接和政治性權力有關聯的，它可以相互存在於知識性、文化性、道德性的權力中。無可否認的，竹越的《南國記》，只是這條南進系譜的濫觴之一而已。這條系譜也未必存有師承關係，它可以透過閱讀、再閱讀，呈現、再呈現的方式延續下去，讓前進南方／殖民地概念，形成一種集體的政治無意識。

五、結語

南進論發展到昭和時期之後，從以實利主義為主的南方進出，逐漸演變為以配合戰局為考量的南方干預。尤其1937年（昭和12）中日戰爭爆發後，日本進入戰時體制，1940年（昭和15）南進政策正式成為基本國策。太平洋戰爭發生之後，「南進政策」和「大東亞共榮圈」的宣傳文本，佔據了日本國內和殖民地的各種傳播媒體。在戰爭期（1937-1945）的階段，文學者的協力是探討南進論不可忽略的一環。當時在文藝動員方面，日本國內多數知名作家都被徵召赴南洋隨軍創作。此外，台灣作為南進基地的地位益形重要，因此連殖民地作家也被動員響應戰爭。所以在這段期間出現了大量配合南進政策的文學作品，諸如詩、小說、評論、雜感等不同文體的創作。其中，有許多小說甚至都以「前進南方」作為結局。無論這些作家是協力者或者被動員者，「往南方雄飛」的構圖，成為他們在書寫策略上的政治無意識。

西方所建構的東方主義，是一套龐大的知識運作體系，也

[52] 矢野暢，《「南進」の系譜》，頁48-49。

是在長遠的歷史時空中進行的。然而，日本帝國版的「南方主義」形成的過程太過匆促，亦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戰敗而夭折。如前所述，在明治時期的南進論者中，志賀重昂和竹越與三郎這兩位人物是值得注目的，因為他們的論點有別人無法取代的特點。志賀重昂在《南洋時事》中，重新賦予「南洋」以獨特的概念而有別於西洋與東洋。而竹越與三郎的《南國記》則是讓日本大眾階層對「南進論」普及認知的最初作品。相對而言，現在的日本大眾階層恐怕就不太清楚這兩位人物，一般的知識份子可能也只是比較熟悉志賀重昂的代表作《日本風景論》，^[53]而並非《南洋時事》。至於台灣的狀況，則是以竹越與三郎的《臺灣統治志》較為研究者所週知，卻鮮少有深入的研究。如此看來，志賀重昂的《南洋時事》、竹越與三郎的《南國記》，縱使曾經是日本南進論述的初期力作，現在似乎已隨著人們對戰爭記憶的褪色或刻意遺忘，而隱沒在歷史之流當中。

但是換個角度來看，《南洋時事》和《南國記》所展現的台灣／南方思維，也可以被不同的文本挪用、衍生，而延續它們的南方再現模式。並且，在明治時期曾經親臨過南方的歷史學家、人類學者、殖民地官吏，也極有可能把他們對被殖民者的文化偏見化為文字記錄，從而流傳下去。對大正、昭和時期的許多日本作家而言，他們不必透過閱讀《南洋時事》和《南國記》，就可以輕易想像南方的光與熱、熱帶與叢林、毒蛇與瘧疾、蠻荒與落後、等待啟蒙與被救贖……。今日，日本的殖民主義已經終止了，但是當年帝國主義所建構出來的南方論述，或許還存在於日常普遍性的文化領域，或是特定的政治、意識型態、社會慣例當中。對現今的一般人來說，縱使他們已經遺忘戰爭的陰影，也不甚了解南進論的政治內涵，但是所謂的南方概念，可以透過各種南進論述被標籤化，從而化約成幾個簡單的印象，並且成為一種想像南方的思維模式。以這種南方論述為基礎，進一步探討殖民地台灣的日本作家所形塑的南方憧憬，當是可以欲求的。

[53] 志賀重昂，《日本風景論》，日本的岩波書店在2006年末還再版此書。

附錄一：《臺灣統治志》章節目錄

第一章：殖民及殖民國	第十二章：鑛物
第二章：在臺灣的日本統治	第十三章：司法監獄
第三章：臺灣統治法制上之觀察	第十四章：人口問題及國家營業主義
第四章：過去的臺灣	第十五章：生番的狀態及番地開拓政策
第五章：臺灣的地勢、自然、人種	第十六章：產業
第六章：土地調查及大租權整理	第十七章：交通、郵政、港灣及船舶
第七章：財政及經濟	第十八章：外國貿易、與母國的商業及通貨
第八章：警察機關	第十九章：衛生
第九章：鴉片專賣	第二十章：教育、宗教、慈善
第十章：食鹽專賣	第二十一章：臺灣歷遊雜錄
第十一章：樟腦專賣	附錄一、有關臺灣著書目錄。二、相片解說。

竹越與三郎，《臺灣統治志》（日本東京：博文館，1905）

附錄二：《臺灣統治志》相片目錄

1、兒玉臺灣總督	10、惜字塔	19、深坑廳屈尺原住民
2、後藤臺灣民政長官	11、新高山	20、阿里山番地的情景
3、台北停車場正面	12、安平鎮製茶試驗場	21、宜蘭廳小湳澳腦寮
4、大稻埕祭禮	13、打狗港內之景	22、臺灣各族原住民（14張）
5、臺灣軍事中的郵件搬運	14、台中葫蘆墩竹筏渡河	23、淡水川養鴨
6、台南城內紅毛樓	15、南庄大東河隘寮	24、荷領期原住民的羅馬字
7、台南市街	16、恆春廳西門	23、民政長官官邸
8、苗栗廳大安溪輕便鐵道	17、臺灣的學校（2張）	24、從總督官邸的屋頂鳥瞰全台北市
9、彰化廳鹿港市街	18、滬尾水源池	

附錄三：《南國記》章節目錄

第一章：往南！往南！	第六章：法屬印度支那
第二章：上海居留地	第七章：南方亞細亞的明日
第三章：香港及廣東	第八章：從印度支那到台灣
第四章：新加坡	第九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
第五章：爪哇及荷屬諸島	

竹越與三郎，《南國記》（日本東京：二西社，1910）

參考書目

一、專書

- 三井邦太郎編輯，《吾等の知る後藤新平伯》（日本東京：東洋協會，1929.07）。
- 小熊英二，《單一民族の起源》（日本東京：新曜社，1995.07）。
- 小熊英二，《日本人の境界：沖繩・アイヌ・台湾・朝鮮植民地支配から復歸運動まで》（日本東京：新曜社，1998.07）。
- 中村孝志編著，《日本の南方関与と台湾》（日本奈良：天理教道友社，1988）。
- 矢野暢，《「南進」の系譜》（日本東京：中央公論社，1975）。
- 矢野暢，《日本の南洋史觀》（日本東京：中央公論社，1979.08）。
- 北岡伸一，《後藤新平》（日本東京：中央公論社，2000.04）。
- 竹越與三郎，《臺灣統治志》（日本東京：博文館，1905）。本文參考之複刻本為《臺灣統治志》（台北：南天書局，1997）。
- 竹越與三郎，《南國記》（日本東京：二酉社，1910.04）。
- 竹越熊三郎編，下山京子著，《竹越竹代の生涯／一葉草紙（伝記・下山京子）》（日本東京：大空社，1995.12）。
- 後藤新平，《日本殖民政策一斑》（日本東京：拓殖新報社，1935）。
- 駒込武，《植民地帝國日本の文化統合》（日本東京：岩波書店，1997.12）。
- Edward W. Said（愛德華·薩依德）著，王淑燕等譯，《東方主義》（台北：立緒文化，1999.09）。
- Edward W. Said（愛德華·薩依德）著，蔡源林譯，《文化與帝國主義》（台北：立緒文化，2001.01）。

二、論文

（一）期刊論文

- 中村地平，〈旅びとの眼——作家の観た台湾〉，《台灣時報》，1939（昭和14）5月號。
- 姚人多，〈認識臺灣：知識、權力與日本在台之殖民治理性〉，《台灣社會研究季刊》42期（2001.06），頁119-182。

（二）研討會論文

- 張隆志，〈後藤新平：生物學政治與台灣殖民現代性的構築〉，《第六屆中華民國史專題論文集：20世紀台灣歷史與人物》（台北：國史館，2002.12），頁1235-1259。
- 張隆志，〈知識建構、異己再現與統治宣傳：『臺灣統治志』（1905）和日本殖民論述的濫觴〉（台北：文化啟蒙與知識生產（1895-1945）國際學術研討會，2005.11.26）。

三、報紙文章

- 本刊撰，〈研究の價值あり〉，《台灣日日新報》，1910（明治43）.12.30。
- 本刊撰，〈雜報／臺灣統治批評〉（一）、（三），《台灣日日新報》，1907（明治40）.08.14,16。
- 在京之非正式記者，〈南洋熱〉，《台灣日日新報》，1915（大正4）.02.18。
- 田原生，〈輕卒なる日本人〉（下），《台灣日日新報》，1911（明治44）.01.15。
- 竹越與三郎氏談，〈現在の爪哇〉（一）、（二）、（三），《台灣日日新報》，1909（明治42）09.12,14,15。
- 竹越與三郎氏談，〈南洋進展策 支那人の歸化案〉，《台灣日日新報》，1916（大正5）.01.27。本文後來翻譯成漢文，刊載在《台灣日日新報》漢文版，1916（大正5）.02.04。
- 社外記者，〈東京便り〉，《台灣日日新報》，1911（明治44）.12.16。
- 岳洋譯（香港デーリーブレスは所載），〈雜報／臺灣統治志批評〉（上）、（下），《台灣日日新報》，1907（明治40）.09.05,06。
- 烏居龍藏氏講演，〈生蕃人種之調査法〉，《台灣日日新報》漢文版，1911（明治44）.02.10。



The Light and Heat from South:

Takekoshi Yosaburo's Colonial Discourse

Chiu, Ya-Fang

Graduate Student, Ph. D Program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Cheng-Chi University

Abstract

"Taiwan Tojishi" (A Record of Ruling Taiwan) was written by Takekoshi Yosaburo (1865-1950), a Japanese historian and statesman, who had used rich archives and documents of Taiwan Governor Government in depicting the development of Japanese colonization in Taiwan. When writing this historical work in 1905, his powerful writing, based upon investigative files and statistics, had strengthened the reliability and credibility of his arguments. In 1910, his another book entitled "Nan-koku Ki" (A Journey to South Countries) expanded the scope of his colonial discourse to cover the areas of southeast Asia. In this book of journey, he sharply observed the political situations of each colony in southeast Asia with exotic eyes. Both of the books, tinged with literary style, were undoubtedly motivated by colonial desire to betray his political unconsciousness of conquering southern territories. After the Meiji Restoration, Japanese had tried every possible way to construct the discourse on their southbound military advance which was well exemplified by Takekoshi's two books. This paper proposes to inquire into the writing of his books in order to gain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formation of the discourse on southbound advance strategy and the representation of colonized countries before wartime.

Key word: south, discourse on southbound advance, Nan-kokuki, Taiwan Tojishi, Takekoshi Yosaburo